二元情境下战略联盟形成的嵌入机制分析*

——社会网络与制度环境融合的视角

王 涛[1], 陈金亮[1,2], 罗仲伟[1]
(1.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北京 100836;
2. 中央财经大学商学院,北京 100081)

内容提要:社会网络和制度环境是影响战略联盟形成的重要情境因素,以往的研究主要是基于单一情境进行分析,很少从二元情境来解释。本文基于理论融合构建跨层次分析框架,阐述二元情境下战略联盟形成的嵌入机制。首先,回顾了战略联盟形成的网络观和制度观,通过对社会网络和制度环境的关联分析,提出两种理论在解释战略联盟形成时具有互补性;随后,基于二元性对二元情境与组织二元进行分析,明确了二元情境与组织二元的关联和差异;进而,通过对社会网络和制度环境进行维度细分,确定了联结性和合法性、中心性和公平性、联结性和公平性、中心性和合法性四个亚组织情境;最后,分析了亚组织情境中战略联盟形成的组织嵌入行为,提出在中心性和合法性、中心性和公平性的亚组织情境下,结构嵌入更容易形成战略联盟;在联结性和合法性、联结性和公平性的亚组织情境下,关系嵌入更容易形成战略联盟。

关键词:战略联盟;社会网络;制度环境;理论融合;嵌入;二元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5766(2015)08—055—10

一、引言

作为推动企业快速成长的重要手段之一,战略联盟已经受到企业管理者和学者们的广泛关注。战略联盟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有着共同战略利益的组织,为达到共有市场、共享资源等战略目标,通过各种协议、契约而结成的一种松散型合作模式。战略联盟可以帮助企业在竞争性要素市场中获得互补资产、创造价值、提升竞争力和扩大市场份额等,例如,获得复杂的技术或产品开发能力等(Lahiri & Narayanan,2013; Oliver,1997)。企业为了实现持续的生存和发展,也会利用不同形式的战略联盟来强化组织间协同和合作,并通过组织间的交换、共享和合作来推动生产经营活动的顺利进行,例如,利用外部知识进行创新,实现流程再造和结构调整等(Yang 等,2014)。战略联盟是一个动态的组织间关联互动过程(Zollo 等,2002),其中,战略联盟形成作为整个活动的发起点,会直接影响后续活动的有效进行和最终绩效评价,对企业来说尤为重要(Arino & Ring,2010)。

Gulati(1998)指出,嵌入行为是一种企业自主行为,可以提高战略联盟形成的可能性。嵌入行为,可以分为结构嵌入和关系嵌入两种模式(Granovertter,1985)。其中,结构嵌入是企业与合作伙伴通过建立组织间正式关系来实现彼此关联的行为模式,主要强调群体机制是如何影响组织间关系。

收稿日期:2015 - 04 - 15
*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开放式创新下基于创新价值链双元平衡的创新搜索及其作用机理研究"(71302128);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转型期劳资关系对企业二元创新能力的影响机制研究"(13CGL073);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基于供应链跨界搜索的港资企业二元创新与企业绩效:动态竞争的权变视角"(12YJC630011)。

作者简介:王涛(1980 -),男,山西阳城人。助理研究员,管理学博士,研究领域是企业能力和组织创新。E-mail:tao_wang_cass@126.com;陈金亮(1979 -),男,河北唐山人。副教授,管理学博士,研究领域是战略管理和供应链管理;罗仲伟(1955 -),男,江苏江都人。研究员,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是社会网络和中小企业成长。

关系嵌入是企业与合作伙伴通过形成非正式关系来实现彼此互动的行为模式,主要强调在组织间互动中如何识别和满足彼此的需求和目标。虽然结构嵌入和关系嵌入作为不同的组织行为,可以通过强化利用外部资源并建立相应的关联关系来推动战略联盟形成,但是,如何选择合适的行为方式,则需要结合到具体情境(De Clercq 等,2014)。社会网络和制度环境属于超越组织层面的客观情境因素,且各自都会影响战略联盟形成。其中,社会网络是战略联盟形成的基础条件,可以为企业搜寻外部合适资源提供通道,并带来实际收益(Gulati,1998)。同时,企业又是处于特定的制度环境中生存和发展的经济组织,在战略联盟形成的社会活动中,必须遵守相应的行为准则(Dacin 等,2007)。因此,在战略联盟形成环节中,企业需要面对既存的社会网络、制度环境等情境因素的综合影响。然而,处于现实环境中的企业很难将社会网络或制度环境隔离开来,并采取有针对性的策略和措施。

Rosenbloom(2000)提出,很难完全依靠单一理论来解释企业活动,需要融合多种理论进行系统分析才能从根本上认清企业行为。Mayer & Sparrowe(2013)指出,在以往的战略联盟研究中,有许多学者试图利用多种理论进行分析,但是,仍未能将这些理论融合起来以实现强化解释力度的目标。因而,如何融合不同理论并建立合适的分析框架解释战略联盟,也成为理论研究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社会网络和制度环境作为情境因素,不仅会单独影响联盟形成,且彼此间还存在交互情形,导致联盟决策更为复杂。从实践来看,企业作为独立的经济组织,必须正确理解复杂情境可能带来的影响,并做出精准的战略决策,即在复杂的社会情境中采取正确战略决策,促使战略联盟形成。遗憾的是,在目前的研究中,针对复合情境下如何形成战略联盟的研究依然是一个空白,需要进一步地补充和延伸,才能为企业实践提供有益的指导和启示。

二、战略联盟形成的网络观和制度观

在市场经济中,大部分企业都会受制于资源、能力等要素短缺的约束,这就要求它们必须同相关组织进行合作,共同抵御可能存在的风险和压力。Kogut(1988)指出,当企业希望降低交易成本,获取竞争优势和增强市场竞争力,或从外部获得一些关键知识时,就需要考虑战略联盟。战略联盟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经过长期的组织间互动、磨合,并最终契合的动态过程。Gulati(1998)基于战略联盟过程从动态阶段特征将战略联盟相关研究归结为五个主题:战略联盟形成、治理结构选择、战略联盟演化、战略联盟绩效和战略联盟评价。其中,作为联盟活动发起源头的战略联盟形成,不仅决定战略联盟合作伙伴的选择,还会直接影响后续一系列问题的解决,是战略联盟研究中最为重要的环节(Arino & Ring,2010)。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们探讨了以环境的不确定、竞争性以及网络的结构洞、中心性等为特征的外部情境因素对战略联盟形成与绩效间关系的影响(Lin 等,2007;Milanov & Shepherd,2013),但是,关于情境因素对战略联盟形成的前因影响分析并不多见。由于企业异质性的客观存在,也使得企业在战略联盟形成的组织间交互活动中会根据特定的情境因素自发地采取合适的角色扮演和差异化的战略活动以促进联盟形成(Tiwana,2008)。因此,对于情境因素的分析成为促进战略联盟形成的关键所在。

战略联盟是企业通过跨越纵向或横向的组织边界与既存社会网络中一些组织形成的关联关系,对社会网络相关特性的认识是企业形成战略联盟的前提条件之一。社会网络理论认为,现代企业不再是一个独立原子,只有嵌入社会网络中才能完成交易活动(Yang 等,2010)。在社会网络的群体中,不同组织会形成水平或垂直的关联交互,其中隐含着潜在的社会分工及合作关系。当企业能够顺利进入社会网络中,则可以以更低的成本和风险来获得公开要素市场上所难以获得的异质性资源。这不仅为企业的未来持续发展提供了更多的潜在机遇,而且也暗示着企业可以采取更为积极、主动的态度来进行对外合作。Gulati(1998)指出,社会网络可以帮助企业识别联盟机会并选择合适的伙伴来促使联盟的顺利形成;Lin 等(2007)也提出,社会网络中的企业位置和结构洞都会影响到战略联盟形成,以及随后的合作绩效。因此,面对既存的社会网络,企业只有完全了解相关的网络特性,才能在随后的活动中以恰当的方式,在合适的位置进入网络并找到合作伙伴,形成战略联盟。

制度环境是基于企业外部的多边关系,以形塑企业运作方式和市场交易模式来影响其社会行为的规则集合。制度环境一旦形成,则可以在相应范围内约束企业参与社会互动的行为(North,1990)。在市场经济活动中,企业必须依据一定的规则以合

理的组织行动来参与组织间社会互动,自觉地采取同社会规则、规范相匹配的行为,并通过与其他组织的不断互动来对自身行为进行调整和修正,遵守社会交易活动中"游戏规则",才有利于战略联盟的形成(Dacin 等,1999)。制度环境理论提出,制度环境作为企业在社会活动中所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集合,能同时起到约束和刺激的作用,可以有效降低企业在市场交易中的成本和风险,并提供相应的保障作用。Lin 等(2009)提出,在战略联盟形成阶段中的企业会面临制度环境的规制,为此,必须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Arino & Ring(2010)也指出,制度环境会通过决定产权、控制权和关系质量来影响战略联盟的形成。为了保障战略联盟的有序开展,参与联盟的企业在联盟形成的初始阶段就必须按照制度环境的要求,确定彼此均认可的规范、规则和认知模式,并在制度层面实现趋同性和一致性。随后,企业才会以彼此均认可的行为来从事市场交易,确保在组织间交互中能够有效获得所需资源,并在影响规模和交易范围上实现扩展和延伸。此后的组织间交互活动也会提升联盟成功的机率,并影响后续对联盟伙伴的评价和联结的质量(Zollo 等,2002)。

社会网络和制度环境作为独立的情境因素,各自具有不同的侧重点,均会影响企业战略的有效制定和实施。社会网络强调,紧密组织间关联可以为企业的社会活动提供基础平台机制;制度环境则要求,企业必须遵守组织间的互动关系规则。虽然也有学者提出,战略联盟本身就是一种网络组织(杨秀玉,2010),然而,即使企业间并不形成战略联盟,社会网络也是客观存在的。同样,制度环境也是不依赖于战略联盟而客观存在的。为此,企业在战略联盟形成阶段,不仅需要注重从现有的社会网络中挖掘出可能存在的市场机会,而且,也需要注意到制度环境可能带来的规制约束等。在经济转型中存在网络和制度的混合形态,但现有的理论研究却很少认识到制度和网络之间的关系(Entwisle 等,2007),给后续研究的开展造成了障碍。结合战略联盟可以看到,社会网络和制度环境在影响战略联盟形成时,存在一种复杂的交互关联状态,即网络中存在制度成分,制度中又蕴含网络因素。其中,社会网络作为一种组织集合,会不断调整、修正企业的经营行为和运作方式,并使之成为联盟参与者在互动过程中的共同认可和接受的行为规则,完成"建制"。同样,制度环境作为一种组织外部行为准则集合,也会对企业形成联盟时的经济行为和运行状态进行约束和规制,要求其只有在满足基本交易规则的基础上才能形成彼此关联,完成"结网"。战略联盟形成的本质也可以理解为一种融合"建制 + 结网"两种动态活动的组织间交互作用,即基于共同规则来建立契约关系,并通过组织间活动形成彼此关联。因此,在解释战略联盟形成时,需要综合考虑社会网络和制度环境两种情境因素的复合影响。

三、组织二元与二元情境

二元性已经逐渐成为管理研究中的一种新范式(刘洋等,2011)。关于二元性的探讨最早可以追溯到 Duncan(1976)的研究,他提出二元机制可以帮助平衡和协调不同的冲突目标或能力来提升绩效。随后,学者们开始将其运用在组织学习、组织适应等管理活动中。现在,二元性已经逐渐拓展到组织行为、战略管理、组织变革、创新管理等诸多领域中(Turner 等,2013)。以往的研究中,学者们对于"二元"概念的理解主要还是集中于单一主体的二元特性来展开,例如差异化和低成本,调整和适应等。然而,需要认识的是,"二元"的本质是指存在本质差异的不同主体,既可以是具体的组织行为,也可以是超越组织的情境因素。这也导致现在的研究需要拓展原有的"二元"分析范式,从二元特性延伸到二元主体。因此,在运用二元分析范式时的重要前提条件是必须明确具体的研究对象,即是具有不同特征的二元主体,还是同一主体的二元特征。结合到本研究,以组织和情境作为研究对象则是分别指组织二元和二元情境。

组织二元是单一主体的二元行为,例如,以适应和调整,探索和开发为代表的组织二元行为。组织二元是存在于组织层面的整体性活动,可以帮助企业通过不同形式的行为模式来从事经营活动,包括在组织内部进行的战略更新、知识创造等,以及在组织外部根据市场环境变化而采取的挖掘市场机会,构建市场竞争力等活动。组织二元的假设前提是作为组织行为模式的两种"极端",其交互是以零和博弈的方式对稀缺资源进行竞争,且由于各自具有自增强和路径依赖的特征,以及彼此间的倾向和组织机制需求的不同,都可能造成组织几乎无法同时追求而导致对立(March,1991)。由此所产生

的冲突、排斥和互不兼容也会使两者间的矛盾不断被激化,对组织的正常活动产生破坏性影响,并最终阻碍组织内部活动的有效进行(March,2006)。如何实现两者间均衡就成为直接影响到企业发展成败的关键所在。在二元行为的运用上,Lin 等(2007)提出,在组织二元行为的作用下,企业采取不同的形式与外部组织建立组织间关联,进而基于信息交换、协商和调整来处理问题,并获取、控制和使用发展所需要的关键资源。然而,在不同的情境条件下,组织二元行为会对组织绩效产生不同的影响(De Clercq 等,2014)。因此,对于外部情境因素的认识就成为企业有效利用二元行为来获得组织绩效的关键所在。

二元情境是存在本质差异的两种情境因素,例如,个体在团队活动中所面对的社会关系情境和绩效管理情境(Gibson & Birkinshaw,2004),以及企业在市场环境中所面临的动态性、竞争性等。当以企业作为分析和研究对象时,一般是指代以网络、环境为代表的能影响企业整体活动的外部影响因素。二元情境作为两种独立存在的情境因素,会各自影响处于其范围内企业行为,并产生差异性的影响。然而,针对一些特定的组织行为或活动,情境因素之间可能会存在一定程度的重叠,并形成较为复杂的交互关系。二元情境的假设前提是强调情境因素之间的交互关联,并通过有效的协调使彼此的作用效益得到兼顾。这种复杂情境也对企业的社会活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例如,企业需要有效识别、利用合适的情境条件来降低潜在的风险,谨慎调整和协调相互矛盾的行为模式来配置跨部门的资源,有效整合企业内外的资源、技能和经验,才能获得更大的社会效益和行动结果。结合本研究,可以看到,在企业参与的社会活动和市场交易时,社会网络和制度环境均是外部情境因素。两者不仅各自会在不同程度上对企业战略产生影响,且两者又存在一定程度的交互,形成了相比单一情境更为复杂的复合情境。因此,如何正确理解并认识社会网络和制度环境,以及由两者间交互所形成的复合情境,将直接影响企业在特定的情境下对联盟战略伙伴的选择和彼此间可能形成的交易关系,以及后续的联盟合作绩效。

四、基于组织层次的理论融合研究框架构建

虽然在研究中可以基于不同理论来更好地认识管理中的不同方面,但是,很多研究问题并不能完全依据单独一个理论,否则,所得的结论可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难以有效指导实践。这时,就需要考虑从理论融合的研究视角,综合多种理论来加以完善,产生更好的解释效果。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们尝试利用理论融合来进行分析,例如,Oliver(1997)通过整合制度理论和资源理论产生了新的视角来解释企业如何获得持续的竞争优势;Mayer & Salomon(2006)将资源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进行融合,以强化对分包的解释力度。这些研究的开展也为理论融合的运用和拓展提供了指导。

Oswick 等(2011)指出,利用理论融合来产生新的研究视角时,可以从各自理论内部寻找不同的构念,甚至是彼此间存在完全差异的构念进行交叉分析。但是,理论融合并不等同于 Fauconnier & Turner(2002)提出的"概念混合"。概念混合是基于概念组合来创造一个全新概念,进而通过对新概念的界定和内涵挖掘来完成新理论构建。理论融合则是基于不同理论在解释同一现象时存在的互补性或协同性来形成新的视角,对社会实践进行解释,进而达到强化对事物认知和理解的目的。Mayer & Sparrowe(2013)也指出,在四种情形下可以运用理论融合:一是两种理论从不同的视角来解释同一种现象;二是两种看起来分离的研究思路,但是事实上并不是分离的;三是两种理论起初是强调不同的现象,但是将其中一种理论运用到另外一个领域来产生新的视角;四是两种理论可能强调相关联的现象,但得出一个相关联的或相同的解释因素。网络观和制度观作为两种独立的理论,可以分别解释影响战略联盟形成,且彼此间存在复杂的交互关联,因而具备了理论融合的基础条件。

Dansereau 等(1999)指出,理论研究的构念既可能独立存在于同一层次,也可能在更高层次上形成一种相互依赖的协作关系。在利用理论融合进行探讨和解释时,由于不同理论的构念存在交互作用,在理论融合的框架设计时,也必须考虑是进行单一层次分析,还是跨层次分析(Oswick 等,2011)。对于本研究的主题"二元"而言,既可以是处于同一层次的构念,也可以是处于不同层次的构念。例如,Adler 等(1999)将企业的效益和弹性看作是同一层次的组织二元行为来展开;王涛、罗仲伟(2011)的研究则是将企业和网络看作是处于不同层次的二元主体来展开。不同层次二元性的内涵

不同,跨层次间影响也是存在的(刘洋等,2011)。于海波等(2004)提出,在利用组织层次分析社会情境下的企业活动时,需要注意那些相对客观的、容易观察到的、源自于集体层面的整体结构特征是如何影响到个体层面的活动;王凤彬(2008)也指出,立足于微观层次与宏观层次相关联的研究设计,需要正确理解其中的情境效应,即宏观层次变量对该微观层次上的因果关系可能起到强度或方向上的"调节"作用。结合本研究,结构嵌入和关系嵌入是企业在战略联盟形成过程中采取的组织二元行为,社会网络和制度环境则是企业在战略联盟形成中组织外部的二元情境因素。从组织二元与二元情境的层次关联分析,可以看到处于组织间层次的二元情境会对处于组织层次的组织二元行为及其绩效产生调节作用,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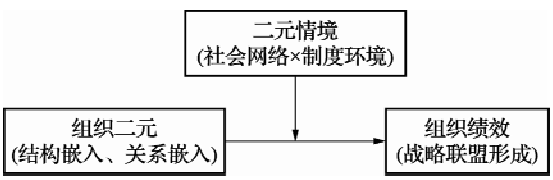

图 1 二元情境与组织二元的跨层次调节效应分析框架

五、二元情境融合下的组织嵌入选择

嵌入行为是企业促使战略联盟形成的重要战略活动。采取结构嵌入是因为经济交易活动使得彼此具有共同的社会联结,可以降低交易成本、避免投机行为等(Gulati,1998)。采取关系嵌入是因为彼此交易互动所形成的信任使得组织间关系逐渐紧密,随后,基于互惠来促进关联双方的合作关系,并影响到后续的资源交换。作为企业的一种战略活动,嵌入行为的实施及其后续绩效会不可避免地受到外部情境条件的影响。社会网络和制度环境作为企业形成战略联盟时所需要面对的客观既存情境条件,两者间存在交互且又各自具有不同的维度。因此,在利用理论融合来分析二元复合情境下的战略联盟形成时,需要基于社会网络和制度环境各自子维度的内在关联性来认识可能存在的复杂亚情境。对企业来说,更为关键的任务是在这种复杂的亚情境中,制定合适的战略决策来形成战略联盟,即在二元情境不同维度交互的亚情境中,选择合适的组织二元嵌入行为来促进战略联盟形成。

社会网络可以为不同类型的组织提供关联,并在优势位置产生利益控制者,即具有联结性和中心性(Milanov & Shepherd,2013)。联结性是社会网络中不同组织间所形成的关联关系,可以实现信息沟通和整合资源,进而为交易活动提供支持(Burt,1992)。中心性则指特定组织占据组织间联结中心位置的程度,展现为网络中获得相应资源和信息的能力(Freeman,1979)。联结性是从横向强调社会网络的覆盖范围,中心性则是从纵向强调社会网络的控制力度。高度联结性使得社会网络中的组织处于紧密关联状态中,过度的网络结构刚性会导致组织间联结无法解构,阻碍企业间联结关系的动态调整,不利于企业进行探索和开发等创新活动(Levinthal & March,1993)。低度联结性会降低企业交易成本,并激发其进入社会网络中通过组织间"联结—断联—再联结"的动态调整,缩短与特定位置的距离,并选择合适的合作伙伴形成战略联盟。高度中心性显示成员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利用和配置能力,其位置特征相对较为明显。占据高度中心位置意味着企业可以更好地增强对能满足其生存和发展的关键资源的控制(Lin 等,2009),为战略联盟形成提供有力的支持。因此,具有低度联结性和高度中心性的社会网络会激发企业进入其中,建立新的交易关系来形成战略联盟。

制度环境会赋予企业在社会活动中恰当身份,并在市场交易中得到平等对待,即具有合法性和公平性(张雁、王涛,2012)。合法性是外部组织对企业行为接受的程度(Dowling & Pfeffer,1975)。合法性作为一种能够产生竞争效益的战略资源,能让企业更容易得到生存机会(Dacin 等,2007)。公平性则指企业在社会活动中得到平等对待的程度(Arino & Ring,2010)。公平性会激发企业参与组织间交互活动,并提供相应的保障措施。合法性是制度环境针对企业个体提出的专属要求,公平性则是制度环境为所有企业提供的普遍权益。合法性是企业从事市场交易的必备前提条件,要求企业必须服从于社会准则和期望。在战略联盟活动中的组织之间会形成正式契约,其中会明确企业的权利和义务。公平性则是企业开展社会活动的重要基础,可以为企业提供同等的机会和待遇,并保障组织间契约关系中的权利与义务得到落实。高度的合法性会让外部利益相关者认可企业的社会行为,提升其在现有商业环境中的战略地位(Lin 等,2009),并为后续的组织间互动联盟活动提供保障。同时,企业只有具有自主平等的社会地位,才能自由选择联盟

伙伴,并在彼此互惠的基础上更有效地形成战略联盟。高度公平性不仅能为企业形成战略联盟的多方交互活动提供动机,还会为在后期的社会资源分配中得到合理结果提供保障(Arino & Ring,2010)。因此,具有高度合法性和公平性的制度环境能为企业从事社会活动提供保障来形成战略联盟。

1. 情境区间Ⅰ:中心性与合法性交互情境下的结构嵌入

社会网络结构形态的非均等化导致网络中不同位置存在一定差异性。高度中心性表示处于特定位置的相关组织在网络中拥有的非正式权力与影响力相对较强,通常也占据着有利的战略位势,在社会资源的控制力度,以及与其他组织的交互关系等方面会具有一定的优势,能获取或创造比非中心性位置的成员更多的价值(Afuah,2013)。制度环境中的合法性则要求企业必须遵循社会规则并符合常规的交易模式,才能获得市场的认可(Dacin 等,2007),通常是与业务关联、区域背景等认同因素紧密关联的,凡是没有得到合法性身份或角色的企业都很难在这种环境中生存和发展。

在社会网络与制度环境存在融合互补的背景下,中心性和合法性之间会存在交互,使得彼此的作用效能得到正向强化。当企业能与趋近中心位置的大型组织实现有效关联来形成战略联盟时,会被赋予较强的合法性。随后,企业容易得到社会网络中更多组织的认可,合法性以梯度的形式在网络中延伸,并有效提高其社会地位,使企业声誉在更大范围扩展和传播,帮助它们进入社会网络并参与到相应经济活动中,以获得高于平均水平的价值收益(Yang 等,2014)。同样,高度合法性意味着企业的社会行为具有较高的认可程度,随后会相应地增加企业与其他组织之间联结和认知机会,强化彼此的联结关系,进而向网络中心演进来提升现有的战略地位(Mitchell & Singh,1996),并进入社会网络占据稳定的节点位置,为寻找合适的伙伴形成战略联盟提供支持。

结构嵌入是立足于网络特性来影响企业的社会活动,并通过与其他组织所共同形成的组织间整体网络结构使彼此间互动成为可能(Uzzi,1997)。同时,结构嵌入又是建立在网络中其他组织对企业认可的基础上,这样,会有更多的组织与企业进行接触,为战略联盟形成创造现实基础。在高度中心性和高度合法性交互的亚组织情境中,企业不仅需要准确识别现有网络中不同组织可能处于的位置,以及其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占有和配置能力,还要具备一定的社会身份和角色,例如外部形象、声誉等,才能在社会交互活动中得到合作伙伴的认可,并为后续的市场交易提供良好的基础。为此,企业必须实行迅速而谨慎的嵌入,否则,其中的时间成本、交易成本等都会给企业的战略联盟活动带来潜在的风险。企业并不需要同所有组织都建立稳定的关联关系,特别是在资源有限的约束下,可能仅需要同一些关键组织来建立战略联盟。因此,可采取的现实路径是利用结构嵌入,与网络中心位置的组织建立关联,并就此来获得相应的身份认同。当企业得到网络中心位置组织的认可后,则可以有效增强企业社会活动的覆盖范围,提升其在社会网络中的认可程度。随后,企业不仅能获得更多的资源,也会得到更多网络成员的认可。在具备了特定的身份认同之后,企业可以更好地与社会网络中不同位置的组织进行组织间交互活动,帮助企业适应社会活动中的基本规则,增加形成战略联盟的机率。由此,提出如下命题:

命题 1:在高度中心性和高度合法性的交互情境条件下,企业通过结构嵌入更容易形成战略联盟。

2. 情境区间Ⅱ:联结性与合法性交互情境下的关系嵌入

联结性是企业从社会网络中获得价值要素的关键,可以帮助企业有效地与外界环境进行直接交换(Granovetter,1985),例如,更好地在组织间转移隐性知识。联结性带来的紧密关系不仅能帮助企业建立良好的声誉和信任来降低交易不确定性,还能让企业在与合作伙伴间的交互过程中获得经验(Afuah,2013)。社会网络的动态演化特性会不断调整网络内部的联结关系,不断出现组织间联结关系的解构和重组。弱关联使得企业在社会网络中的交易转换成本相应较低,并根据需要进行“断联和再联结”,选择合适的合作伙伴形成新的交易关系。同时,企业社会化活动必须遵守相应的契约,并对此做出合适承诺(North,1990),以确保按照相应的规则和秩序来从事后续的市场交易活动。只有当企业遵守这些基本的规则后,网络中的组织才会与企业开展更深程度的接触,并形成联结关系。

社会网络的联结性与制度环境的合法性之间

也存在交互作用,使得企业在形成联盟时,既存在其有利之处,也面对更大的压力。低度联结性会让企业更容易进入社会网络,其中存在的结构洞会为企业进入社会网络,寻找到合适的组织来形成弱联结提供相应的便利条件,例如,由一些中小企业所组成的区域性创新群落中所存在的联结关系,以及组织间对偶交换质量将直接决定互动活动是否有序进行。在高度合法性要求的制度环境中,企业必须满足基本的身份要求并得到认同后才能进入社会网络中。在低度关联性的社会网络中,企业行为的规制程度相应较低,但也必须遵守一些常规性做法,如此才能保证企业行为得到社会网络中其他成员的接受,并在随后的彼此认知中得到其他组织的信任,有利于企业从网络中选择不同的合作伙伴来形成战略联盟(Trienekens,1999)。

关系嵌入强调企业必须立足于自身活动与其他组织互动来共同形成联结关系(Granovetter,1992)。这种非正式关系纽带不仅可以成为企业社会活动的通道,还可以为企业在社会网络中寻找合适的组织形成组织间关联提供支持。在低度关联性和高度合法性交互的情境中,企业获得较大的行动自由,能发挥出更强的主观能动性,并在具体操作中通过试错的方式形成合适的组织间关联。随后,以渐进方式从网络边缘位置节点进行嵌入,逐渐培育和塑造出相应的合法性来寻找到合适的伙伴以形成战略联盟。虽然很多企业都希望以最短的时间,最有效的方式和最低的交易成本来形成战略联盟,并构建一个以自身为核心的新网络,与每一个目标组织建立关联,但是,这种情况在企业实践活动中通常是很难实现的。因为大部分企业都存在资源和能力有限性的约束,而建立网络关联也并不是一项没有成本的工作,需要消耗大量的资源,且管理组织关联活动也存在能力极限,需要企业具有较强的治理能力。出于规避风险和降低成本的考虑,在此种情境中的企业一般会选择从现有网络联结中存在的弱关联中切入,例如,通过彼此都熟悉的第三方中介服务机构来形成联系(Zhang & Li,2010)。在此过程中,企业基于社会网络分工体系发掘机会并确定自身的角色定位,其社会身份和功能也会在网络中不断被明晰,更多的网络成员也会重新审视企业相关情况来主动构建出合适的关联关系,为后续联盟活动做好准备工作。由此,提出如下命题。

命题 2:在高度合法性和低度联结性的交互情境条件下,企业通过关系嵌入更容易形成战略联盟。

3. 情境区间Ⅲ:联结性与公平性交互情境下的关系嵌入

在低度联结性的社会网络中,组织间关联关系相对较弱,企业可以在平衡其风险后以更低的成本建立外部联结关系。特别是松散的社会网络会存在较多的结构洞,位于结构洞位置的组织可以通过协助和引导企业进入现有的社会网络中,扩大企业的活动空间。企业也具有更多的选择性,即可以根据自身需要从社会网络中的不同位置选择合适的嵌入位置,或对处于网络中部分位置的企业进行替代,或基于社会分工细化来延展现有的网络节点(王涛、罗仲伟,2011)。高度公平性的制度环境具有配置公平和程序公平(Arino & Ring,2010),企业可以自由地与外部组织建立弱关联,以较低的交易成本进行后续的组织间互动,并逐渐建立起信任关系。当企业认识到这种潜在的公平联结机会存在时,就会促使自身更积极地进行对外接触活动,例如,发掘社会网络中可能存在的创新来提升自身竞争力。

低度联结性和高度公平性的交互情境会为企业社会活动提供有利契机。只有企业处于合适的网络范围内且组织间的桥连接幅度越大,则能够接触大量的多样化知识和资源(Tiwana,2008)。低度联结性的社会网络可以为扩大网络覆盖幅面提供支持,让更多的社会主体参与到特定的结构性分工与合作中。随后,企业可以利用组织间网络联结关系作为通道,采取相似的行为导向和活动来获得高质量的信息交换(Uzzi,1996)。同时,这种社会化活动也会推动社会网络的联结关系在一定的时空维度进行扩展和延伸。网络联结性的影响作用会更明显地体现出来,对公平的制度环境产生正向反馈作用,即具有社会广泛认可的公平准则会得到更多组织的遵守,并在更大的范围内得到传播,对更多的社会活动起到规制作用。作为一种社会交换条件,处于联结关系的交易双方会基于互惠来保证这种联结活动的稳定和持续有效(Blau,1968),进而将原有的弱联结加以强化并转变为强联结。

关系嵌入可以帮助企业与其他组织建立长期的非正式关系,使得组织间关系变得更为密切。通过利用关系嵌入,企业不仅可以自由搜寻合适的目标企业,还能在此基础上产生彼此的认同感来随时理解对方的行为(Uzzi,1997)。虽然网络内的强联

结关系可以强化组织间的关联程度,例如,使得知识直接交互和整合程度得以加强,但是,降低了创新的可能性(Tiwana,2008)。战略联盟的一种重要作用是帮助企业从多个不同的专业领域吸收、学习多样性思维和知识,进而推动后续的创新活动(Yang 等,2014)。在低度关联性的社会网络中,企业可以更方便地同网络成员建立起合适的弱关联,获得相应的多样化信息、资源等多种形式的社会支持。弱联结的存在也会导致企业在与其他组织进行互动时,并没有建立起合适的稳定关系,潜在的战略联盟伙伴之间容易产生信任危机,造成组织间联结关系的断裂,不利于战略联盟形成。高度公平性提供了有益的互补,要求企业需要认识到必须在彼此互动中建立起合适的公平机制,充分考虑对方利益,实现共享等(Uzzi,1997)。在公平原则下,企业需要在彼此互动的过程中以坦诚和尊重的态度对待合作伙伴,并利用合适的沟通渠道对组织间互动过程中的不当之处进行修正和采取合适的补偿措施。例如,出于维护彼此弱关联的考虑,可以采取互惠策略来使主观的管理策略和客观的运营机理保持协调一致。如果企业在与目标企业互动的过程中感到满意,能共同面对问题来寻求解决方案,则会建立紧密的互动来强化彼此的关联关系(Gulati,1998),降低可能存在的不确定性和投机行为以促进战略联盟形成。由此,提出如下命题:

命题 3:在高度公平性和低度联结性的交互情境条件下,企业通过关系嵌入更容易形成战略联盟。

4. 情境区间Ⅳ:中心性与公平性交互情境下的结构嵌入

社会网络中的成员会按照其实力的差异而占据不同位置来从事结构性资源配置工作。处于中心位置的一般是网络的核心成员或领导者,通过与中心位置的组织建立关联来更好地进入网络(Granovetter,1985)。Yang 等(2014)也指出,与大企业间形成联盟关系意味着小企业可以发现新的机会来构建新的竞争力,更好地适应外部环境,并整合跨组织边界的竞争力(Rothaermel & Deeds,2004)。为了保证社会网络的持续稳定发展,在严格的等级制度和细化的分工体系中,还需要基于公平机制在网络内部建立统一的规则,从而有效防范和阻止可能存在的消极行为、机会主义行为等,并保障网络内组织间的互动得以良性进行。当制度环境中的企业得到公平对待并存在有力的保障措施时,则企业有更强的动机和意愿去参与多方交流活动,且能在社会资源分配中得到合理结果,从而实现持续的正向强化效应。

社会网络的中心性与制度环境的公平性存在交互性,并以互补的形式来实现彼此协调。社会网络的良性发展需要在网络内部建立公平机制,其中包括交易程序公平、交易过程公平等(Arino & Ring,2010),企业可以准确地认识并遵守网络中的相应准则以防范不确定性(Fern Cardinal & Neill,2012)。在市场交易活动中,企业也能更容易获得相关信息,并出于自身发展的需要,积极参与到相应的网络活动中,进而向网络中心位置进行演进以增强自身实力。随后的组织间交互活动也会提升企业社会活动质量,例如,利用公开信息渠道认识其中具有影响力的组织,与之建立关联关系形成稳定的商业纽带来提高企业的社会地位。同样,网络中的高度公平机制可以保障社会网络的高质量运行,协调组织间的彼此良性互动和网络整体效益的逻辑扩展,从而实现在更大范围、更深程度来进行市场交易活动。

结构嵌入作为一种有前提条件的嵌入模式,会对企业行为产生一定约束力来规制其社会活动(Gerrit 等,2000)。在发起战略联盟初期,企业必须关注潜在的合作伙伴可能处的网络位置,以及其可能扮演的信息传递角色。如果企业能够接近中心位置的组织,并与之建立起合适的关联关系,则能从其中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和发展机会。在结构嵌入作用下,社会网络成员间的关联会得到快速建立,并推动企业从事相应的多元互动活动,随后,企业才会考虑在此联结的基础上通过多种方式来降低其中的不对称程度(Uzzi,1997),例如信息分享、分工合作、决策协调与利益分配等。企业进入社会网络的初衷是寻找合适组织来形成战略联盟,但是,社会网络又会对企业产生一种无形影响,要求企业必须感受到外在环境所存在的约束性行为准则,并以合理方式来回应这种外部刺激,即企业必须按照一定的目标和规则融入到社会网络中。结构嵌入会产生一定的约束力确保企业服从于网络规范,并在从事社会活动时满足潜在社会秩序和活动准则,促使其参与到互动活动(Uzzi,1997)。随后,企业才能在网络中与其他组织进行有效的沟通和交流,减少在合作中的投机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战略联盟参与方对彼此的了解(Raub & Weesie,1990)。由此,提出如下命题:

命题 4:在高度中心性和高度公平性的交互情境条件下,企业通过结构嵌入更容易形成战略联盟。

六、结论与未来展望

本文的研究主要是基于理论融合视角分析在社会网络和制度环境二元情境下,企业如何选择合适的嵌入形式形成战略联盟。在社会网络与制度环境融合的情境条件下,合适的嵌入行为能让企业进入到社会网络中与其合作伙伴形成战略联盟,即在中心性与合法性、联结性与合法性、中心性与公平性和公平性与联结性交互的不同亚情境条件下,可以考虑选择以结构嵌入和关系嵌入为代表的组织二元行为来促进战略联盟形成。结合本文的研究,可以看到,社会网络理论和制度环境理论都可以解释战略联盟形成的实践活动。同时,社会网络与制度环境之间又存在互补关系。因而,本文采取理论融合的思路来展开相应的研究和分析,利用社会网络和制度环境两种理论的融合,来进一步扩展现有研究对战略联盟形成的认知程度。同时,提高了对战略联盟解释的力度,特别针对在融合亚情境中企业如何选择合适的嵌入行为进行细致的探讨,为后续研究的开展奠定了较好的理论基础。

虽然本文尝试从理论融合的角度来探讨现实中的战略联盟形成问题,但是,依然还是存在一些不足,需要在以后的研究进一步深入。一是研究中选择社会网络和制度环境来进行融合分析,然而,除了这两种理论之外,学者们也利用其他一些理论来解释战略联盟形成,例如复杂理论、交易成本理论等。未来研究可以考虑,能否将更多的理论进行融合并构成新的研究框架进行后续分析和探讨。二是本文选择了战略联盟活动过程中的起点——联盟形成来进行分析。然而,战略联盟是一个连续的动态组织活动过程,社会网络和制度环境作为外部情境,会一直影响企业战略联盟活动的全过程。未来研究还可以继续思考联盟形成后的其他环节是否也会受到社会网络和制度环境二元情境下的综合影响,以及会产生何种影响,企业对此又该采取怎样的应对措施? 最后,本研究主要集中于理论分析,在后续的研究中还可以利用实证研究来做进一步验证分析。

参考文献:

[1] Arino, A. & Ring, P. S. The Role of Fairness in Alliance Formation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10, 31, (10): 1054 - 1087.

[2] Dacin, M. T., Ventresca, M. J., Beal, B. D. The Embeddedness of Organizations: Dialogue and Directions [J]. Journal of Management, 1999, 25, (3): 317 - 356.

[3] Gulati, R. Alliances and Networks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98, 19, (4): 293 - 317.

[4] Lin, Z., Yang, H. B., Arya, B. Alliance Partners and Firm Performance: Resource Complementarity and Status Association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9, 30, (9): 921 - 940.

[5] March, J. G. Exploration and Exploitation in Organizational Learning[J]. Organization Science, 1991, 2, (1): 71 - 87.

[6] Mayer, K. J. & Sparrowe, R. T. Integrating Theories in AMJ Article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13, 56, (4): 917 - 922.

[7] Milanov, H. & Shepherd, D. A. The Importance of the First Relationship: The Ongoing Influence of Initial Network on Future Status[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13, 34, (3): 727 - 750.

[8] North, D. C. I 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90.

[9] Oswick, C., Fleming, P. & Hanlon, G. From Borrowing to Blending: Rethinking the Processes of Organizational Theory Building[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11, 36, (2): 318 - 337.

[10] Uzzi, B. Social Structure and Competition in Interfirm Networks: The Paradox of Embeddedness [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997, 42, (1): 33 - 35.

[11] 刘洋,魏江,应瑛. 组织二元性:管理研究的一种新范式[J]. 杭州: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6).

[12] 王凤彬. 企业间组织的跨层次分析——兼析企业专业化与集团多元化的关系[J]. 北京:中国工业经济,2008,(3).

[13] 王涛,罗仲伟. 社会网络演化与内创企业嵌入——基于动态边界二元距离的视角[J]. 北京:中国工业经济,2011,(12).

[13] 杨玉秀. 关系网络、社会资本与战略联盟的发展[J]. 武汉:湖北社会科学,2010,(7).

[14] 于海波,方俐洛,凌文辁. 组织研究中的多层面问题[J]. 北京:心理科学进展,2004,(2).

The Embeddedness Study of Strategic Alliance Formation under an Ambidextrous Context: ——A Combining Perspective from the Social Network and Institution Environment

WANG Tao[1], Chen Jin-liang[1,2], LUO Zhong-wei[1]
(1. Institute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Beijing, 100836, China;
2.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way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firms, strategic alliance contributes to acquiring complementary resources, creating idiosyncratic value and improving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Therefore, strategic alliance has been paid a lot of attention by scholars and practitioners since this particular business form emerges. The first topic related to strategic alliance is the formation of strategic alliance. Almost all the people care about is topic because of its importance. Scholars focus on the mechanism of strategic alliance form, and practitioners focus on how to build a kind of strategic alliance. With the increasingly distinct impact of social network and institution environment, it is necessary for both scholars and practitioners to consider the effects of social network, institution environment 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m. Being a new management research method, theory combining emerges during the recent years, and a large number of literatures discussed the definition, character and effect of theory combining. In 2011, theory combining perspective was advanced in the special topic forum on theory development of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There are a lot of advantages to explain firms' behavior by using theory combining perspective, for that it is difficult to talk about all things clearly with only one theory. It will be more comprehensive to combine social network and institution environment together to explain the mechanism of strategic alliance formation. Although social network and institution environment are both the important elements in the strategic alliance formation, few researches integrated both theories together to explain the strategic alliance formation before. As a new research method, theory combining can optimize and advance the existing theory base, and create a new research perspective to explain the past researches. In this paper, strategic alliance formation is studied based on the combining perspective from the social network and institution environment. Firstly, social network and institution environment theory were reviewed and the complementary of the two theory perspectives were discussed. Social network focused on betweeness and centrality. Betweeness is the connect relationship among the different organization in social network, while centrality is the central intensity of specific organization in social network. Environment theory focused on legitimacy and justice. Legitimacy is used to describe the acceptance of other organizations in the environment, while justice is used to describe equal level that the organization is treated by the environment. Then,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context ambidexterity and organizational ambidexterity, the relationship and difference of context ambidexterity and organizational ambidexterity were discussed in order to build the cross-level analysis model. Context ambidexterity indicates that there are two kinds of context factors, one is social network, and the other is institution environment. Organizational ambidexterity also indicates that there two kinds of organization embeddedness, one is structure embeddedness, and the other is relational embeddedness. Structure embeddedness is used to describe the connection among the different organizations by formal organization relationship. While relational embeddedness is used to describe the connection among the different organizations by informal organization relationship. After that, social network and institution environment are conjoined together and four regions are formed which are betweeness and legitimacy, centrality and justice, betweeness and justice, centrality and legitimacy. And we found that structure embeddedness is beneficial to the strategic alliance in the context of centrality and justice, centrality and legitimacy; and relational embeddedness is beneficial to the strategic alliance in the context of betweeness and legitimacy, betweeness and justice. With the theory combining perspective, the mechanism of strategic alliance was explained in a comprehensive framework. This paper is a trying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of theory combining in organization and firm field. With the application of theory combining, strategic alliance formation was discuss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network and institution environment, and meaningful results were found. More and more scholars begin to analyze the problem by using theory combing perspective. And there will be a lot of advantages for scholars to use the theory combining perspective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strategic alliance; social network; institution environment; theory combining; embeddedness; ambidexterity

(责任编辑:弘 毅)